

修
辞
文
萃
丛
书

修辞学

李维琦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王希杰 李维琦



修
辞
文
萃
丛
书

修辞学

丛书主编 王希杰 李维琦

李维琦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T1085281

10 8 528 1 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辞学 / 李维琦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修辞文萃丛书)

ISBN 978 - 7 - 5648 - 0703 - 0

I. ①修… II. ①李… III. ①古汉语—修辞学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1582 号

修辞学

李维琦 著

◇责任编辑: 谭南冬

◇责任校对: 胡亚兰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703 - 0

◇定价: 21.00 元

序 言

◆王希杰

李维琦教授的《修辞学》作为他和我共同主编的“修辞文萃”中的一种再版了，这是汉语修辞学界的一件大事，我想说几句话。

1986年我去长沙到湖南师范大学讲学，一到宾馆，老朋友秦旭卿先生就说中文系系主任李维琦教授马上来看你。并说，李主任跟我通过信。后来李先生担任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积极筹建出版社，创办《古汉语研究》。我每次到湖南师范大学，李校长都到宾馆来看我，还给我送行，即使是他生病住院期间。由于李先生是古汉语专家、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后来专攻佛学词汇，我们在学术上交往不是很多。他的专长是我不能插嘴胡说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佛学等我是外行。我只能说说他的《修辞学》。

李维琦教授的《修辞学》曾是周秉钧教授主编的“古汉语”丛书中的一种，所以是一部《古汉语修辞学》。李先生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他是杨树达的再传弟子。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是古汉语修辞学的经典。李先生的《修辞学》和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部古汉语修辞学著作，是“湘派修辞学”的标志性著作，共同引领古汉语修辞学研究的风骚。

同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相比，李先生更重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引进了苏联的同义学说，努力构建一个古汉语的修辞学新体系。古汉语修辞学不是很重视体系，理论上跟着现代汉语修辞学走，在这部著作之前似乎没有一个古汉语修辞学体系。李先生对汉语修辞学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古汉语修辞学体系，以同义修辞学说为核心的修辞学体系。而且，这个古汉语修辞学体系不仅是属于古

汉语的，而且适用于现代汉语修辞学。这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理论的一个大收获。

李先生继承杨树达的传统，又积极吸收外国修辞学理论，既脚踏实地，严谨朴实，又敢于独辟蹊径，大胆创新，他成功地把“湘派修辞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现代修辞学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李先生对汉语修辞学的贡献还有他同王大年等合作的《古汉语同义修辞》，这也是同义修辞学的重要著作。李先生等继承了杨树达的传统，把修辞学与训诂学紧密结合起来。或者说，他们在训诂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古汉语修辞学。

学术的繁荣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学术的进步不靠豪言壮语空头口号，群众运动不能推动学术的繁荣。学术繁荣是继承和创新的产物。学术繁荣需要重新认识学术传统。李先生的《修辞学》虽然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学术影响，但是还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重新认识是汉语修辞学继续发展所必需的。“修辞文萃”重新出版这部修辞学著作就是为了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的繁荣。

我个人以为，李先生的《修辞学》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术创新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急于求成，浅尝辄止，是很难有所成的。创新需要引进，但是只有真正吃透一种新理论才能够谈得上引进。创新是好，但是需要学术基础，需要多方面的基本功。李先生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语法学、古文献学等多方面功底是其《修辞学》成功的保证。

出版李先生的《修辞学》也是为了学风、文风的建设。李先生的学风和文风都是值得赞美与学习的。在目前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李先生的学风都是值得提倡的。学术水平是评价学者的重要指标，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由其学术水平所决定的。这是常识。但是切不可忘记，科学精神、学风问题，也是坚定一个学者的根本。杨树达和李维琦的共同点是：学风好，具有科学精神。

再版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至今还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修辞学著作，这也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湖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修辞文萃”丛书的意图。

李维琦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前副校长，是我的老朋友，我自信我这样说并非感情用事。

请读者阅读李先生的《修辞学》吧。

李先生的《修辞学》已经被写进了多部汉语修辞学史，早有定评，也留给后代修辞学史家去评论吧。

最后要说的是，湖南师范大学的秦旭卿教授也是“湘派修辞学”的一员大将，“湘派修辞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对“湘派修辞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期待“湘派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2012年5月22日

南京秦淮河畔

目 录

绪论·····	(001)
一、修辞与修辞学·····	(001)
二、修辞的标准·····	(003)
三、修辞学的体式·····	(009)
四、学习、研究修辞学的意义·····	(011)
第一章 音韵修辞·····	(015)
第一节 传其声情·····	(015)
一、声的模拟·····	(015)
二、音的组合·····	(018)
第二节 和其音韵·····	(020)
一、押韵·····	(020)
二、双声叠韵·····	(024)
三、复重·····	(030)
第三节 谐其音节·····	(032)
一、节奏·····	(033)
二、奇偶·····	(036)
三、错落·····	(038)
第二章 词汇修辞·····	(041)
第一节 选用同义词·····	(041)

一、一般同义	(041)
二、模糊同义	(044)
三、单双同义	(047)
四、语法同义	(050)
第二节 活用词义	(052)
一、转类	(052)
二、异义	(054)
三、双关	(056)
四、连及	(059)
五、参互	(061)
六、曲解	(063)
第三节 变换词形	(065)
一、形的拆并	(065)
二、音的分合	(067)
三、字的替代	(068)
四、词的节缩	(070)
第四节 丰富词汇	(072)
一、引进	(072)
二、创新	(077)
第三章 语法修辞	(080)
第一节 权衡繁简	(080)
一、词的删简	(080)
二、成分的省略	(090)
三、词语的繁复	(097)
第二节 比量同义结构	(103)
一、成分的不同位置同义	(103)

二、句子的不同成分同义·····	(110)
三、结构或成分的不同表示法同义·····	(118)
四、合叙、共用与分述同义·····	(125)
第三节 选择同义句型·····	(128)
一、语态、语气·····	(128)
二、谓语性质·····	(133)
三、句子结构及松紧·····	(136)
四、分句的次序·····	(139)
第四章 特殊修辞 ·····	(145)
第一节 提炼·····	(145)
第二节 比喻 起兴·····	(156)
一、比喻·····	(156)
二、起兴·····	(167)
第三节 借代 映衬 藏词·····	(169)
一、借代·····	(169)
二、广义借代·····	(175)
三、映衬·····	(186)
四、藏词·····	(189)
第四节 比拟 夸张 引用·····	(191)
一、比拟·····	(191)
二、夸张·····	(194)
三、引用·····	(198)
第五节 对偶 排比 错综·····	(200)
一、对偶·····	(200)
二、排比·····	(205)
三、错综·····	(207)

第五章 古汉语修辞学简史 (213)

第一节 萌芽时期 (214)

一、修辞的目的和作用 (214)

二、修辞的标准和要求 (215)

三、修辞的原则和手段 (216)

四、言谈的技巧和方法 (217)

第二节 成长时期 (221)

第三节 创立时期 (238)

第四节 发展时期 (242)

附录

一、唐钺论修辞格 (节录) (244)

二、《二十四诗品》今注 (253)

后记 (292)

再版后记 (294)

绪 论

一、修辞与修辞学

“修辞”二字连用，古书中出现较早。《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意思是修饰词语，表达自己真诚的信念。作为书名，始于元人王构的《修辞鉴衡》。其序言说：“（此书）教为文与诗之术。”这里的“修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修辞已相去不远。修辞，通常就是指修饰词、语、句，再宽一点说，就是修饰语言或言语，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关于修辞的不同定义，大都从这里引申出来。为了对修辞有较具体的了解，下面举出一些实例：

（1）文士怀才，譬若武夫握利兵焉。弓矫矢直，洞坚贯札，洵可为利器矣。或用之以为盗，或用之以御盗，未可知也。此则又存乎心术矣。（章学诚《章氏遗书·评沈梅村古文》）

（2）少游与子瞻同席，自矜髭髯之美，曰：“君子多乎哉！”子瞻戏曰：“小人樊须也。”（《邵氏闻见后录》）尤借对之的者，况又全用经语。（孙奕《履斋示儿编·诗说》）

例（1）是说文士怀才，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做好事，正像武人操持利器，可以为盗，也可以御盗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取决于思想如何。用上比喻能让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刻，例（2）记秦观与苏轼的一次开玩笑。“君子多乎哉！”“乎”、“胡”同音，秦观以君子自许，夸自己胡子多。“小人樊须也”，“樊”、“繁”同音，“须”指“胡须”。苏轼讥笑秦观，说小人才胡须繁密。这里用同音双关构成借对——对偶的一种；两句又都是从《论语》中引出的现成话，修辞上叫做引用。有趣的自夸，

善意的讥嘲，反映了两位朋友之间亲切的交情与和谐的关系。

(3) 近日诗流……不曰莺啼而曰莺呼，不曰猿啸而曰猿唳。蛇未尝吟，而曰蛇吟，蛩未尝嘶而曰蛩嘶。厌“桃叶蓁蓁”，而改云“桃叶抑抑”，桃叶可云抑抑乎？厌“鸿雁嗷嗷”而强云“鸿雁嘈嘈”，鸿雁可言嘈嘈乎？油然者作云之貌，未闻泪可言油然。荐者祭之名，“士无田则荐”是也，未闻送人省亲而曰“好荐北堂亲”也。（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九）

(4)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

(5-1)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

(5-2)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

例(3)杨慎所批评的，是追求新颖而用词不当，实际上是同义词选用问题。例(4)“五十”、“七十”之后探下省“亩”字，这是为了音节匀称的缘故，与音韵修辞相关。例(5)《史记》改“多是”（过多地肯定）为“多”（称赞），改“修”为“循”，属于词汇修辞。此外，又易“不必”、“未必”为“不”，以便与前后形成对偶句式；删去“之王也”、“之灭也”，变两句为一句；加连词“故”，舍弃“然则”与文末“也”字，句型相同，只是表示法不同。这些我们都看成语法修辞。

由此可见，修辞就是用各种语言手段来改善语言的表达方式，加强它的表达效果。修辞学则是总结修辞的历史，研究修辞的手段、方式及其应用，概括修辞规律的科学。古汉语修辞学以古代汉语为研究材料，由于古代汉语是过去时代的语言，现在一般不再使用，学习修辞主要就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认识和了解古代汉语，所以不侧重讲修辞手段和方式的应用。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两者在修辞的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讲古汉语修辞，

对现代汉语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修辞的标准

修辞的标准怎样，修辞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有的完全不同，有的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其中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观点能为较多的人所接受。陈先生提出适合题旨与情境是修辞的标准与依据。题旨即说写的事项、所要表达的意思。情境包括：①写说目的是劝化人，使人了解，还是同人辩论；②是谁说给谁听，写给谁看，写说者与读听者的关系怎样；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说话写文章。这是总的提法。分开来说，修辞划分为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两大类。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积极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就行。关于消极修辞，《修辞学发凡》明确提出四条标准（原书称为“纲领”）：①意义明确；②伦次通顺；③词句平匀（指选用“本境的”、“现代的”、“普遍的”词语）；④安排严密（词语切境对机叫稳，词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叫密）。至于积极修辞，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如同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能在读者、听众心里唤起具体的印象，获得“感受”。

我们不区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但不否认为这两大修辞所拟订的“纲领”。我们尤其赞同以适合情境和题旨为修辞的总标准。下面提出得当、得体、简约、明白等四点看法对这个总标准的某些方面作阐述和补充。

《礼记·祭义》：“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一个词语，一个语言形式，把它安排在恰当的地方，就叫得当。正如古人所说：“靨子在颊则好，在颞则丑。”酒窝生在嘴角边，那就漂亮，假如长到额头上，就难看了。修辞也是这样，词语没有绝对的好坏，用在该用的地方就好。如《夜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洪迈《容斋随笔》所载：王安石这首诗，“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

‘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又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个“绿”字定得好，它不仅与“到”、“过”等字一样，能显示出动态，而且进一步赋予春风以造化的功能，它带来生机和春色，使得江南满眼新绿。“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诗）江南草长，与下句思乡正好相应。刘长卿诗：“新年草色远萋萋，久客将归问路蹊。暮雨不知湓口处，春风只到穆陵西。孤城尽日空花落，三户无人自鸟啼。君在江南相忆否，门前五柳几枝低？”富寿荪《唐诗别裁·校记》指出：“肃、代之时，江淮间有刘展之乱，穆陵以东，光、黄、舒、庐皆苦兵扰，不识春和矣，其西则差安静，故有第四句。”可知“春风”是双关，兼指政治局势。这里的“到”却不可改为“绿”。时局惨淡，又是新年久客，暮雨孤城，伤时感事，如果用上绿字，显得生意盎然，便与全诗的题旨、情境无法调和。“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绿酒生微波。”（李白《前有樽酒行》）“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诗句中的“过”字、“入”字、“满”字同样用得恰到好处。在一个地方不好用，到别的地方还是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和得当相联系的是得体。写说者与听读者总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所写所说能与这种关系相应，写说能注意到写说的场合，就叫得体。如果是写文章，文章有文体，有风格，能符合文体的要求，能取得风格的一致，也是得体。我们下面举些不得体的例子，反过来看，什么是得体也就能有所了解。

（1-1）（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史记·淮阴侯列传》）

（1-2）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汉书·韩信传》）

（2）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

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刘勰《文心雕龙·指瑕》）

（3）凡人摘裂书语以代常谈，俗谓之掉文，亦谓之掉书袋。掉书袋三字见马令《南唐书·彭利用传》。利用自号彭书袋。传中所载掉文处，真堪绝倒。传有云：或问其高姓，对曰：“陇西之遗苗，昌邑之余胄。”又问其居处，对曰：“生自广陵，长侨螺渚。”其仆尝有过，利用责之曰：“始予以为纪纲之仆，人百其身，赖尔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废，侮慢自贤，故劳心劳力，日不暇给。若而今而后，过而勿改，予当循公灭私，挹诸市朝，任汝自西自东，以遨以游而已。”……利用丧父，客吊之曰：“贤尊窀穸，不胜哀悼。”利用对曰：“家君不幸短命，诸子糊口四方，归见相如之壁，空余仲堪之棺，实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见。”遂大恸。客复勉之曰：“自宽哀戚，冀阙丧制。”利用又曰：“自古毁不灭性，杖而后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虽则君子有终，然而孝子不匮。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欷歔。吊者于是失笑。会邻家火灾，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向迓，自钻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扑灭乎？”又尝与同志远游，迨至一舍，俄不告而反。诘旦或问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犹倚陈平之户，窃恐数钩之重，转伤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类如此。（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九）

例（1）《史记》“愿为假王便”较为得体：我愿意做代理齐王，以便治理。韩信仍愿受汉王节制，为王的雄心又不可抑止，自然应当这样说，以求得刘邦的同意。《汉书》改为“臣请自立为假王”，本来是“自立”，但既要汉王批准，就不好自己这么说。例（2）刘勰批评曹植不该讲他父亲（曹操）的死是“尊灵永蛰”，只有昆虫才能“蛰伏”。又指出曹植的另一个语病，他在《冬至献袜

颂》里说：“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圣体”是讲明帝曹睿，说“浮轻”有失庄重，“施之尊极”，就不得体了。刘勰也承认潘岳有才华，但没有放过他文章中的缺点。“感口泽”是悲母亲逝世的（见《礼记·玉藻》），“心如疑”只用于长辈（见《礼记·檀弓上》），弄错了对象。例（3）转述彭利用“掉书袋”的事，说话照古书搬，就不可能得当。如“不幸短命”是孔丘在别人面前讲他的学生颜回早死了的话，现在用来指父亲去世，自然要成为笑柄。就算是都得当，写在纸上给懂古书的人看，或者还可以，用这些话来进行日常交际，不顾场合瞎说，遭到讪笑是必然的。

《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达”是表达，把意思说明白，下面将要讲到。“辞达而已矣”，不再多说，这就是简约。古代论为文简约的不乏其人，其中论述得比较充分的要算唐朝的刘知几。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并提出了一些删繁就简的办法。《史通》专门讨论史书。不但历史，一切文章都要简约。陈骙说：“且事以简为工，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则·甲》）清人刘大櫆对简的意义阐述得更透彻，他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论文偶记》）。

言简意丰，以较少的笔墨叙明较多的事情，确是修辞的一项重要标准。要达到简约，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像刘大櫆所说，要意真、辞切、理当，文笔老到，目光邃远等。否则，一味追求简约，就势必使文字疏漏晦涩。这种现象看得多了，有人就以为简约不见得能成为标准了。比如刘器之就说：“《新唐书》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迁、固载相如、文君事凡五百字，而读之不觉其繁，使子京记之，必曰‘少尝窃卓氏以逃’而已。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正在此两句。而反以为工，何

哉？”（转引自《淳南遗老集·新唐书辨惑》）《新唐书》除了生造词语、变易旧文之外，它行文的毛病还在于疏略与晦涩，并不是简约本身的过错。

顾炎武有一个说法：“辞主乎达，不主乎简。”《日知录·文章繁简》说：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饔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饔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诮良人之所之也。”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诮之……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顾炎武举的例子说明：当简则简，当重就重。简约虽是重要标准，但不是最高标准。如果简与达产生矛盾，简应当服从于达。语言首先要求明白，它的功能才能得到发挥。尽管如此，简约仍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杨慎《丹铅杂录》在“辞尚简要”小标题下说：

吾观在昔文敝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删节，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宿学尚迷，焉能晓童稚乎？

这里反对繁冗的见解经得起辩驳，所举繁冗的事例也不可否认。

《论语》说：“辞达而已矣。”这个“达”实际上就是明白，前面已经两次提到。杨树达作《中国修辞学》，立“避嫌”、“别白”二目，“避嫌”和“别白”都是为了使文意明白无误。目虽是杨氏所立，而所举全是古书中的例子，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必须把话说得明白无疑。如《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顾炎武《日知录》卷四说：“《尚书》之文但